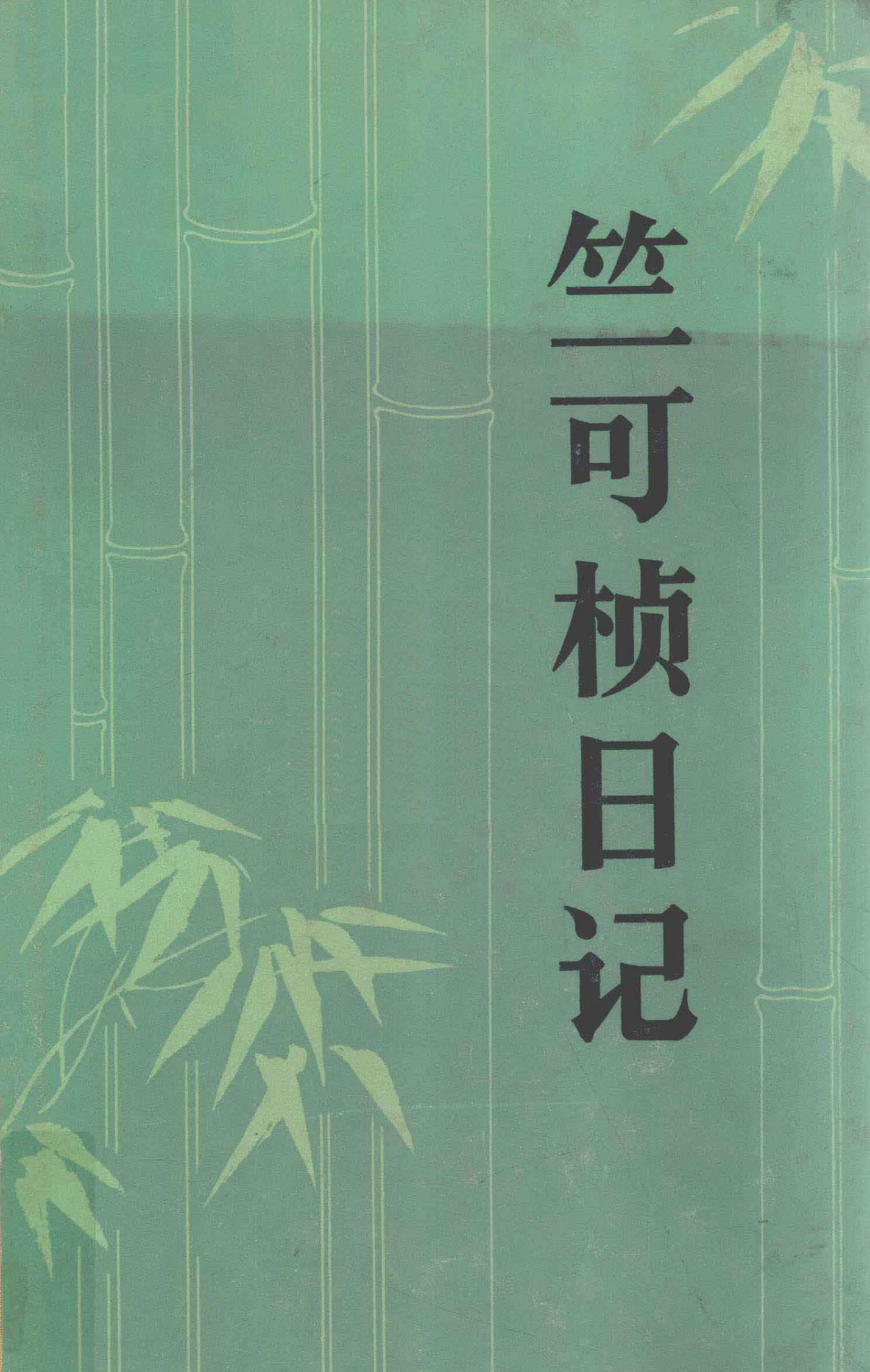


竺可桢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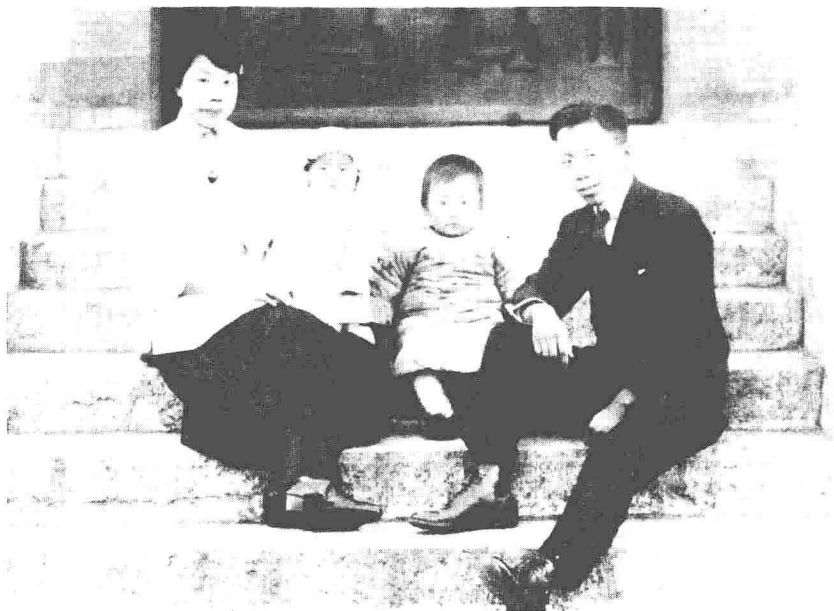


陸
倫
日
記

人 1
民 9
出 3
版 6
社 | 1
9
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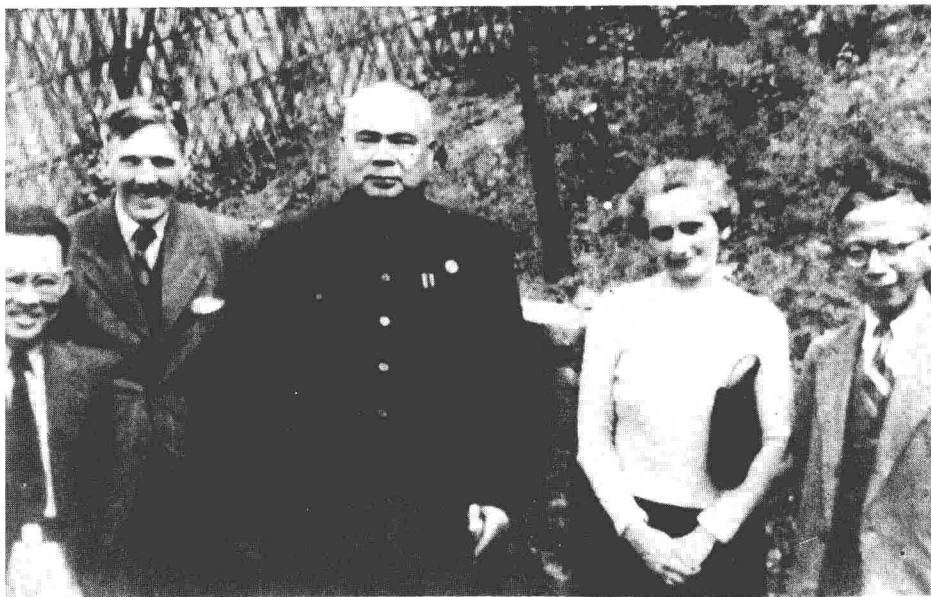
1918年摄于美国波士顿。



竺可桢与夫人张侠魂、长子竺津（希文）、大女儿竺梅合影（摄于1922年）。



1936年，竺可桢、张侠魂、竺梅、次子竺衡与胡焕庸在黄山。



1946年5月在重庆与冯玉祥合影
(右一竺可桢，右三冯玉祥)。



1947年春与浙大校友朱祖祥、赵明强、熊全治、余文琴摄于美国密州东兰辛车站。

1947年11月在杭州与李四光等合影
(左一竺可桢,左三李四光,右三李四光夫人,右一竺可桢夫人)。



作者简介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年青时曾在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和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读书。1910年公费留美；先就读于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读气象学，1918年得博士学位回国。在此期间，参加留美学生组织的、我国最早的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成为该社骨干成员之一。回国后，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地理学和气象学，两年后转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任地学系主任，教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和世界地理等课。1925年曾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次年转至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27年中央研究院筹备时，应院长蔡元培先生之邀筹建气象研究所，旋任所长。1936年4月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仍兼气象所所长。1944年辞却气象所所长职，浙大校长职则任至1949年4月底。此外，解放前作者还兼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及地理学会理事、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社理事，并曾一度担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主任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先后被选为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地理学会理事长、气象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等。1974年2月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竺可桢早年从事气象学研究，其中对台风的研究等颇受国际

政策、培养人材等方面尽心尽知地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位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深受尊敬的科学界领导人。

竺可桢又是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不但使浙大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比较完备的综合性大学，而且由于他坚持民主学风，十分爱护学生，对使浙大成为解放前学生运动中少数“民主堡垒”之一大有帮助，因此受到师生的由衷爱戴和社会上的重视，以至有些人认为他是我国蔡元培先生以后有数的大教育家之一。应该指出，他长浙大的十三年，除头一年局势还比较地平稳外，余十二年都在战乱动荡和艰难困苦之中，然而就在这种条件下，浙大却在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是极其难得的。这虽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他作为校长，无疑起了主要的作用。

竺可桢一生讲究求是精神（即追求真理、忠于真理的精神），凡事注重事实，不附和，不盲从，亦不专横武断；临事只问是非，不顾个人利害；办事认真负责、公平合理；勤奋好学，至老不殆；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人朴实无华，对人诚恳、谦虚，在同事、学生中极得人心，久而弥深。

竺可桢在解放前是位爱国的、民主的学者。建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战士，并于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顾高龄，以最大的热忱和责任心对待党和国家的事业。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竺可桢自我努力的结果。竺可桢不愧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位楷模。

茅以升序

竺可桢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不仅是我国科学普及事业、地学方面多门学科和科学史等研究事业的倡导者，并且是我国近代地理学与气象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从二十世纪初，他就怀着炽烈的爱国热忱矢志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披荆斩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五十余年间，他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并在教育事业、地理和气象等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第一次见到竺可桢同志是在1916年。那时，我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听说有个华人办的宣传科学的组织“中国科学社”，就去申请参加。由于作为社员要经常为社刊写一些文章，而科学社的创办人之一又是竺可桢，所以，我便与他有了些接触，但那只是一般的联系而已。直到1920年回国后，我和竺可桢同在东南大学任教，我们才有了进一步的交往，了解到了他的一些思想和经历。

我与他交往更多的还是在1936年，我在杭州建造钱塘江大桥的时候。那年，他也正好到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校长。时值浙大缺少任课的教授，故此他邀我去为他们做不定期的讲演，他闲暇时也曾到我的住处来互叙友情或共进晚餐。有一次，他竟还兴致勃勃地同我一起到工地上去看造桥，并在那儿呆了一上午。回来后，又特意写了篇日记来描述那天他所看到的情景（我在1981年才见到这篇日记并编入了我的《钱塘江建桥回忆》集）。他虽然不是搞土

黄秉维序

《竺可桢日记》(1936—1949年)即将出版,编者要我写一序言。竺先生一生可为我们矜式的言行,他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中的建树,他在学术研究中的贡献,浩浩如海洋。我所接触到的不过是一鳞一爪。他的著作,我还有许多没有读过;他的日记,我也仅看了很小一部分。虽然与故旧晤谈,常怀述竺先生往事,实则所涉及的亦只太仓一粟。自惭所知有限,所以踌躇不敢着墨。然而前此已有诺言,不应轻易失信,乃不揣浅薄,写成此文,略述在我心目铭刻最深的印象。

竺先生的亮节高风,也许可以用“正道直行,竭忠尽知”两句话来概括。他热爱祖国,殷切地希望民富国强。他身体力行,始终贯穿着这一坚定不移的志向。他勤奋地学习和工作,他以极大的毅力,建立、推动和从事科学研究,置身于教育事业。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而到了关键时刻却不屈不挠,挺身而出,凌霜厉雪,义正词严。他表里如一,公而忘私。他在旧社会中出污泥而不染,在解放以后,认识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他不随风摇摆,敢于坚持真理,不顾利害毁誉,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虚怀若谷,写文章先请好些人提意见,然后修改补充。讨论问题,也从善如流,不固执己见。他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气象和地理,对其他科学同样抱着很大的兴趣和热忱。他爱护青年,关心青年的成长。所有这些,我曾在《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内的一篇短文中谈过。现在我深切地体会到,所有这些,是一位无限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平凡而伟大的科学家的正道直行。他的伟大常常与

首先，日记中记有大量竺可桢言、行、感想，对于了解、学习他的为人、做事、治学之道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是十分宝贵的资料。竺可桢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不但在学术上有卓越成就，在科学、教育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他“正道直行、竭忠尽知”的精神品德深受其友好、同事和学生们的称颂。他一生热爱祖国，为爱国、爱人民而献身于科学、教育事业；他倡导、笃信并身体力行“求是”精神，对他的学生们颇有影响；他公正、民主、勤奋、谦虚。这一切日记中都有很好的反映。在我国建设两个文明的今天，这是大大值得研究、学习的；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更为重要。对于竺老，过去一些介绍相对侧重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工作成绩方面，因此大家自然地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对于他所以成为卓越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对于他所以从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品德则研究得不够，介绍得不够，而这部日记的出版，相信可以有助于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日记这种体裁，有什么写什么，最为真实。尽管每天所记似乎是分开的事，但前后综看，就包括了各个方面，还包括了随时间而发生的演变，这是了解和研究作者思想和实践最生动、最具体的好材料。这里要说明的是，整个日记虽然经过摘选删节，但仍力求保持竺老思想、言行的整个原貌和有关当时历史原状的记述。例如竺老当时对共产党缺乏了解，日记中也有一些偏颇的见解，现在都保留原状不动。我们认为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竺老为人景仰的整个形象；并且，我们觉得只有如此，才符合历史实际和实事求是原则，也才能使人认识竺老从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演变过程和其中的规律，这对了解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必须指出，竺老在这十四年的日记中，从无一处使用国民党惯用的对共产党的污蔑性称呼。这一点使我们在摘选过程中印象深刻，因为他长期生活在“污泥”环境中而能如此不为所染，实在是很难得的。这固然和他的科学家的客观态度分不开，毕竟也说明了他在政治上之从来不苟同于国民党。

其次,这十四年正好包括了作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的全过程,浙大的事情在日记上记得很多,包括抗日战争期间浙大如何颠沛流离地四迁校址和胜利后如何复员回杭州;包括浙大在这期间规模和学风都有所发展提高;还包括当时浙大师生的困苦生活情形等。这些,对当时就读于浙大或内地其它大学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和走过的道路,不用说必会深有所感;即使对于目前的青年学生,读读这部日记,了解当时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当时的大学师生如何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和求得学问,也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日记中还有大量的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很明显,它们和蔡元培先生当年主持北大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竺老长校的时间长些、时代近些,因此也有其不尽相同的地方。竺老的办学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总结,例如他认为学校教育必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尤重于德,德主要在明辨是非,唯真理是求而不计利害;批评只重专业不重德的教育为“谋食而不谋道”。又如他认为大学必须具备多科而以文、理学院为基础;大学必须发展研究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

第三,日记中还记有大量当时的时事和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状况等资料,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增长见闻。当然,私人日记只能涉及作者接触的范围,而且所记都分散在每天日记中,在综合性和完整性上远不如一般历史书篇,但是日记有具体和生动的特点,这是一般历史书篇所不及的。目前论述这段不平凡时期的历史书篇已经不少,但用日记记下整个过程而出版的,这还是第一部。读这部日记,抗日战争前夕那种山雨欲来、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的局势(反映为日记中的西安事变、庐山谈话会、救亡运动等等记实),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全国人民的奋起;后来国民党愈来愈腐败,国民党统治区里人民生活愈来愈困苦,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终于弄到众叛亲离、天怒人怨而迅速败亡,解放后则如长夜过去、旭日东升等等历史大事的演变都清楚可见。应该指出,由于竺老当时所处地位的关系,他和许多国民党上层领导人有过直接接

触,包括和蒋介石、汪精卫、蒋经国、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等,所以日记中对他们都有所记载,从中可以得知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内幕情况,例如当时国民党军队包括空军中的种种腐败情形,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如何会突然深入贵州和如何又迅速撤回的具体内幕等,这些记载,在别的历史书篇上恐怕是不易看到的。此外,日记所记浙大学生运动情况,特别是1947年下半年以后的,如著名的于子三烈士惨案前后经过,记得很详细。虽然它只是作者从校长角度得见的部分,并不全面,但仍然很值得一读。

第四,日记里有当时中国科学界的许多重要史料,如中央研究院历次会议的经过,各种科学团体和不少科学家的活动,以及各种科学、文艺奖金的发放记录等。日记还从头至尾每天记载当地天气情况和物候现象。在作者外出旅行的日子里,日记中常有当地地理情况的记载。在他长住于一地时,则往往还有那里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的记载。竺可桢好读书,日记中还有大量读书笔记,其中不少是当时各科学领域的进展情况。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料,随时可被人用来解决某个特殊问题。例如竺可桢本人就曾于1962年应郭沫若之请,查阅日记中几次过娄山关时的天气情况记录,用以核对毛主席《娄山关》词中“霜晨月”一句是否为写实。正如英国阿诺德·贝尔特所说“日记的价值与日俱增,数百年之后所记琐碎之事都有价值。”日记中具有丰富的科学资料,是这部中国首次出版的科学家日记的重要特色。

此外,日记在记述上的认真细致和日记中体现的竺可桢治学的严谨不苟,也值得注意。前一点的实例,如他在旅行中往往将沿途各站地名、高程、各站间距离、到达和离开各站的时间等随时手记而在日记中列成表格详细说明;如逢开会,往往将参加者人名成串写下,把会议发言人的姓名、发言内容和发言时间详细列出;即使象在浙大接见学生自治会代表时,也会把所有到会代表的姓名、系别、年级一一记明。后一点则如他对这一时候主要科学论文《论二十八宿之起源和地点》的态度就是很好例子。为写此文,

事先他曾遍查有关文献，在日记上记有多达六七万字的笔记。在文章发表且已取得国内外重视之后，1947年春他利用在美国的机会，继续到许多图书馆去查阅国内无从得见的书刊，进一步加以探讨。

日记中还有一些见闻和掌故，如1946年底他在法国、英国所记当时巴黎面包如木头，牛奶、鸡蛋少得可怜，年轻女子上街多穿木底鞋子；英国买物几乎都要票证，农民养鸡、养奶牛所得鸡蛋、牛奶大部分要上缴等，虽然零碎，但读起来颇为有趣，可以丰富见闻；今昔对比，也有助于我们增强推进四化建设的信心。

以上这些都是这部日记的特点。虽然现在出版的日记已经经过摘选，上述各项内容都颇有删落，因之作为资料备查的价值已经不如原日记，但是这种科学家日记的特色却仍清晰可见。

三

日记的整理分两步，第一步是摘选。摘选的原则是力求只压篇幅而不影响竺老思想、言行的原貌和保持历史原状。具体做法，凡是孤立的私人来往、零星事件和重复的记载都删掉，对广大读者意义不大的内容也删掉；而足以显示竺老为人、做事、治学之道的内容，竺老所做讲演和所写文字（日记中载有的）都选入；足以显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内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有关办学的大事，也都予以保留，但具体细节则适当删略。此外，天气情况中只保留阴、晴和特殊天气记载，其它气温、气压、湿度、云状、云量等都不取；读书笔记则只保留篇幅短小、专业性不强和至今读来仍有意义的一小部分。经过反复斟酌，目前所出日记的正文字数约占原正文的二分之一弱，全书总字数则不及原本的三分之一，即删去的远大于保留的。即使如此，这部日记篇幅已经不小。

整理的第二步包括汇总、校核、翻译和注释。竺老是忙人，他不能花很多时间记日记，因之日记中不免有笔误，包括人名的写错，所引古籍的记误和错字、重字、漏字、赘字等。我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量做了改正。日记中的外文，为使读者阅读方便，除专有

名词未尽译出外，都已译成中文。另外，我们又尽量对人名和某些事件作了一些注释，并编了三个附录。由于水平所限，肯定还有遗漏和欠妥之处。

整个整理工作经过约两年半。参加摘选的有林巧巧、胡维平、陈素子、王昌荣、刘赓书、张家范、雷引（谷长禄）、钱炜、毛正棠、许国华和吕东明十一人。汇总和校核、翻译、注释则由许国华和吕东明担任。吕东明是总负责人。在注释方面得到前辈胡焕庸、陈训慈、张宝堃、吕炯、王国松、陈立、竺士楷、江希明、卢鋈、李絜非等老先生和沈自敏、过兴先、黄宗甄、赵松乔、施雅风等多位同志的指导；帮助通读全稿的有高庄、茹让、徐砚华同志，谨向他们致谢。这部日记的整理出版，得到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院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学会的大力支持，也在此敬致感谢。

吕东明 许国华

1983年5月

凡 例

1. 本书内所有日记，月、日、星期一律用汉字；地点如原缺不一定补上（如原为外文，则予译出。不论原有、新加或译出，一律以仿体排印，不予分别）。年份则于年首一次标明。日记本文一般不分段，读书笔记则视情况另分段或不分段。

2. 某日如无需要摘取的内容，该日即不摘，亦不另加说明。日记正文内所有删节之处，均用……表示。

3. 原日记绝大部分无标点，今一概加上，不另说明系摘选者所加。

4. 凡可以读通的文句，尽量保持原状，那怕稍有费解或欠顺之处。确实可以肯定为笔误的错字、重字、赘字、漏字，即予更正，不另说明。如必须加字，则所加之字用方括号〔 〕括起（即方括号内之文字皆编者所加）。如其字迹不清、难以辨认，或者可辨为某字而意义仍不清楚者，原保留原状而以〔？〕或加脚注注明。

5. 凡日记中所记人名而可以确知其为写错者，即予更正，不另说明；否则就保留原状。按日记中同一人而记为音同字不同的两种乃至三种写法的例子很多，如（吴）正之、政之（吴有训），（蒋）梦麟、梦磨、孟邻，（陈）公治、公侠（陈仪），（陈）辞修、嗣修（陈诚），（高）直厚、直候，（周）麟阁、纶阁，（商）企予、启余（商震），（鲍）祥麟、祥龄，（虞）翔麟、翔林，（邵）天宜、天毅，（魏）春富、春孚、春甫，……等等，由于不确知是否另一种写法必定错误，只好都予以保留。其中有的已用脚注说明为同一人。

6. 原日记中的外文，凡有含义的，一律译为中文。其中确有把

握的,为节省篇幅,不再附原文;如无把握,则在译文后附录原文;如有疑虑,则保留外文而以脚注说明。如系专有名词,则屡见的尽量译为中文,偶见的亦有未译的。又,作者在原日记中曾有中译的外国专有名词,如British Council译中英文化协会,U.T.C.

(Universal Trading Co.)译世界贸易公司,Marriot译麦里倭特等,原则上都采用作者译法,但如原有几种不同译法,则统一于一种;而常见人名、地名之原译法不符合今通用译法的,则尽量改用今通用译法,如希特勒、斯大林等,这些都不另外说明。所有由编者译出的中文,一律以仿体字排印,以示在原日记中实为外文(即日记中所有仿体字皆系编者所译)。凡外国人名之译为中文名者,均列于书后外国人名汉译检索(附录三)中,以备查对。

7. 日记中出现的人名,凡加注后有助于理解且编者能予说明的,尽量用脚注说明。人名脚注一般在初见时出现,只说明其姓名、字(或号)、业务专长和当时职务。凡日记中已写明其身份的,一般不注(因此浙大学生都不加注)。但有的人在职务变动之后与日记内容有较大影响的,则亦有第二次或第三次加注的,此时注文,重点在指明职务的变动。重要的中国人名,不论日记本文中曾否加注(因为日记中写明其身份的人不一定加注),书后都列于中国人名检索(附录二)中,以便查阅。又,日记中偶而有以××代人名者,则系编者所为,目的是为隐其名。

8. 此外,日记中的生僻古字、古词,地方方言以及其它难解之处,也适当以脚注形式加以说明,但此类注文不列入附录。

9. 日记中所引古书中的文字,有的已据原书核对校正,但因工作量过大,仍有不少未曾核对。

10. 日记中涉及的重大事件,编成《大事记要》,列为附录一,以备查阅。